

江上激流好竞舟

——追记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

○潘高峰 郭泉真 江胜信 梁建刚

江上舟——

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78年又回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攻读信息专业硕士学位。1979年通过国家考试，赴瑞士进修；1987年获苏黎世理工学院数字移动通信技术博士学位。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海归”。

1991年出任三亚市副市长，1993年出任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局长，海南建省后首批拓荒者，“第一批上《东方之子》的政府官员”，“新中国第一位博士市长”。1997年起历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重大专项组组长、中芯国际董事长、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

2011年6月27日，江上舟走了。像扁舟远行消失在地平线尽头。沿着他劈波斩浪之后的水路，他生前关注、筛选、扶助、投身的又一个又一个国家重大科研专项，百舸竞渡。

春晖篇：绿叶对根的情意

江上舟的求学路是纵有坎坷亦要向前的“接力跑”：因“文革”被迫中断在清华大学的学习，恢复研究生招生后才又重新考回母校。一番失而复得，愈发激起他



江上舟学
长

的求知若渴。

江上舟的留学路是跑到天涯也要回“家”的“长跑”：在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的8年求学，让他眼界大开。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40岁的他没有在瑞士做任何停留，毅然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海归”，勇立潮头。

——作为海南建省后首批拓荒者，江上舟1991年出任三亚市副市长，1993年出任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局长，发布“最小行政干预、最大经济自由”的“洋浦宣言”，成为“第一批上《东方之子》的政府官员”、“新中国第一位博士市长”；

——作为科研战略产业布局领军人物和浦东开发开放践行者，他1997年起历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国家

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重大专项组组长、中芯国际董事长、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力推上海工业改革转型，力促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10年前，江上舟被查出罹患肺癌。病重之后，他去了趟井冈山，爬两步停一停，坚持爬到山顶。他的坚持，是对父辈足迹的缅怀，是对自身信念的砥砺，更是对大好河山的致敬。

10年间，和病魔赛跑，他忘我工作，为国家筛选出大飞机、集成电路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重大战略专项，为上海布局半导体装备、太阳能、第三代移动通讯等重大战略棋子，促成一个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零”的突破。

10年后，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在等待一个消息，“益科博”聚焦光热发电厂项目并网发电的消息。为了这个项目，他去年4月亲自带队赴海南争取支持，却也就在这个4月，癌症转移到了肝。“他就是在拼命！”“益科博”董事

长项晓东两次去医院探望，每次都带去项目最新消息，“这就是最好的礼物”。首次带去的项目资料，一周后再探望时，发现放在床头的资料，已翻得卷边了。就这次，江上舟反复叮咛中突然哽咽了，失语了，落下泪来，最后他说：“可惜我看不到了……”弥留之际，他噙泪叮嘱秘书：“一定代我去看看这项目。”

他一遍遍对一批又一批探望的人说：“一定要薪火相传，一定要把事情做下去啊。”江上舟的遗愿，是哪怕生命终止都终止不了的牵挂。

夏霖篇：选种育苗呕心血

和在实验室搞研究的科学家不同，江上舟是一位战略型科学家，既要有微观的专业知识背景，又要了解宏观经济形势和区域经济特点；既要具备超前意识，又要具备实干精神；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思路开阔；既要持有敏锐的判断力，又要看准了的重大项目转换成决策者听得懂的语言，争取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

曾和江上舟一起上书，促成2000年国务院1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出台的微电子专家马启元说：“他是一位LEADER（领导者），科技产业化的领军人物。”——

“1998年夏天，



2002年4月，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贺美英、校友总会秘书长郭樑赴上海看望校友，期间专程赴医院探望江上舟学长。

□ 怀念师友

我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到上海参加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举办的‘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正巧旁边坐着吴启迪，一听我名字就说‘我先生要见你’。她先生就是江上舟，下午就赶来见我了，就如何改变中国‘有脑（电脑）无心（芯片）’谈了3小时。他提出联合一些海外专家提个方案，我答应下来。

“那年秋天，我去香港大学任教。为落实我们的君子协定，两个月我飞上海见了他6次。平时就打长途，基本隔天通一次电话，每次一谈两三小时。

“那年11月，我们在上海策划了一个微电子产业论坛，信息产业部领导来了，我们呈上拟好的方案，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后来就有了国务院18号文件出台，和随后的产业大发展。

“江上舟是拼命三郎，工作连轴转，满脑子都是做事。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从没谈过家长里短，一开口就是工作。有次和一位中央领导一起吃饭，他竟然把工作想法写在餐巾纸上，直接递给领导。他做事就一个标准——为了项目。

“他呈现给我们的，一直是神采奕奕的模样，我根本想不到他走得那么快。追悼会那天，我送上一个红玫瑰的心形花环，比喻他付出极大心血的芯片产业，也代表他对国家科技发展的炽热忠心。”

曾和江上舟一起推动大飞机工程的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何志庆说：“他是一位眼光独到、雷厉风行的学者型官员。”——

“2001年下半年我在北京，接到上海航空工业集团总部来电，说上海市政府一位领导很关心大飞机，想见见我这个驻京

代表。那年冬天，我见到了江秘书长。

“那天他西装革履，很潇洒，声音洪亮，激动时会哇啦哇啦吼几句，谈了3小时，抽了一包半烟。

“那时，大飞机项目基本无人问津，但江秘书长坚持认为，从国家和民族的战略角度讲，这一步必须走。

“谈完后，我送他进电梯，他突然转过身，用平淡的语气告诉我：‘小何，我得了肺癌，明天要动手术，肺要切掉一部分。’我一下呆住了，无法想象一个明天就要动大手术性命攸关的人，今天居然坐飞机赶来和我谈这些。江秘书长接着又说，他手机会一直开机，除了开刀时没法接，其他任何时候，只要有关大飞机，他都会接。

“第二次见他，也在意料之外。他动完手术刚两周多，中央几家单位联办一个大飞机研讨会，我打电话告诉他，没想江秘书长立即激动起来，说，‘我要参加！’我提示他，地方官员参加这个会并不合适。他很坚持，一定要来，要向中央领导表达上海的态度，还要我想办法把他从医院‘偷出来’。

“那天，我安排了一位司机，在医院门口接他直奔机场。没想飞机晚点4小时，等我从首都机场接上他送到会议驻地，已晚上10点半。他累得浑身冒虚汗，但吃过一碗泡面，就乐呵呵地与当时中央政研室副主任郑新立谈开了，一直谈到零点过后。第二天一早，又与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谈，一直谈到中午去机场，当天下午再溜回医院。”

重大专项请来论证的专家，大都由各单位推荐。为了多考虑国家利益，少局限

于地方和部门利益，为了让专家们多说真话，少说、不说违心话，江上舟“约法三章”：一、专家发言不代表单位，只代表自己，回去不用汇报；二、专家对每个问题都要表态，发言内容经整理后，须由本人签字确认；三、专家只能表述自己的观点，而不可否认他人的观点，以让各种意见充分表达。这套工作法，被专家们公认为保证论证程序公平、公正、公开，减少扯皮的最高效方法。

面对观点之争，作为重大专项组长的江上舟要有足够的辨识判断力。他坚持学习，经常充电，掌握最新信息，弄清核心问题。他常埋在高高的资料堆里，一读就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又精神奕奕忙这忙那。

惜时如命，只争朝夕，江上舟带动周围的人一起忙忙碌碌，行色匆匆，有人曾笑言：“都舍不得上洗手间的时间。”但和他一起做事分明又是酣畅淋漓的，工作不再只是工作，更是事业。

秋露篇：合木成林荫凉现

在江上舟的大力推动下，中芯国际2000年8月1日在上海张江打下第一根桩，13个月后正式投产，创造了世界最快建芯片厂纪录，实现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零”的突破。自此，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呈现几何级数效应。到2004年，仅上海一地，就已汇聚6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10年前，上海集成电路销售额约50亿元，而今达539亿元，占全国37%。

在代工之外，中国还形成了自己的研发团队。上海市经信委电子信息产业处处长林晶介绍：“10年前，我们比别人落后

四到五代，每代约需18个月。现在我们芯片量产规格可做到65纳米，年内有望达45~40纳米，而国际目前最先进是32纳米，我们落后一到两代。”马启元介绍：

“过去，我们没有芯片，全部依赖进口。今天，全世界每100个芯片，就有10多个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再受制于人，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江上舟推动的燃料电池汽车、光热发电等项目也初见成效：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大范围采用燃料电池汽车，中国技术跻身世界前列，燃料电池公共汽车已经出口海外；光热发电项目已在浦东落户，并在三亚进行项目中试，应用前景看好。

在这一桩又一桩喜事背后，是“人”在起作用：如何慧眼识才，如何人尽其用，如何以情留人，以政策留人……江上舟心怀赤诚，成为很多海归创业者的引路人。现任科技部部长万钢，中国领先的芯片设计公司展讯通信的创始人武平，半导体核心设备制造商中微半导体的首席执行官尹志尧……他们在回国创业之初，都得到江上舟的大力支持。

如今已是上海睿励科学仪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吕彤欣依然清晰记得——2004年12月31日那一天：江上舟推延安排好的化疗，飞北京与他商议起草集成电路发展报告，一直聊到2005年1月1日凌晨3点，新的一年已悄悄到来，“他心里装着国家，装着大局，装着我们这些创业者，唯独没有装他自己。他让我们感动，更让我们敬佩。”

冬晴篇：日落枝头别样红

“江上舟走了”，这个消息让不少人

□ 怀念师友

惊愕，尽管知道他患癌10年，尽管知道他的病情几次复发，但他在他们的印象中，比健康人还有精神。

只有和他熟悉的人，才知道他一直在坚持。

最后一年，他大多住院，却好几次偷偷溜去外地开会。有天他突然发烧，但很想第二天去北京开会，便让驾驶员买来退烧药，晚上9点服药睡下，嘱咐驾驶员每两小时叫醒服药，直到喝完第4遍药后的凌晨4点，他的体温才终于下降，第二天一早成功开溜。好几次把病人看“丢”的医生，实在想不出别的招，干脆把江上舟的鞋子藏起来。

最后一月，他还在和中国银联磋商，如何在银联卡装“中国芯”，以利于中国金融安全。他让人把手提电脑和资料带到医院，大家戴着口罩一起工作，“这一点就连他夫人都劝不了。不让他工作，他要吼的。所以只要情况还可以，我们都要听他的，有时还要帮他在护士那边打掩护。”

最后半月，他把一个心愿，托给都江堰友爱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季军。汶川地震后，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的江上舟，发起捐建了都江堰友爱学校。他曾答应孩子们，今年“七一”带他们上北京看升旗。7月1日清晨，痛失朋友的季军如约把孩子们带到了天安门广场。第二天一早，季军赶回上海，把孩子们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带到了江上舟的追悼会上。

最后一周，6月20日，他躺在病床上最后一次参加中芯国际董事会的电话会议。手机被没收了，他就偷偷用助理吴宏鲲的。会前还半躺着，昏昏欲睡，分明一

位垂危的人，可手机一拨通马上思路清晰。一个多小时的会，他几度发言。怕别人听不清，还坚持把手机拿起，放在嘴边，长时间举着。

最后三天，6月24日，他已陷入昏迷。曾长期主管上海工业的原市政协主席蒋以任深深懂他，在他耳边大喊了一声“集成电路”，江上舟立即清醒过来。因喉咙插着管子无法说话，他急得左右扭动着脖子，当再听到“集成电路装备样机很成功”的消息，他才安静下来，眼神神采光亮。

最后一天，6月26日，长居国外的大儿子赶到床前，父亲已深度昏迷，但眼睫毛动了动。一向敬畏严父的小儿子，最后一月几乎天天守在医院。常年在京工作的妻子，人生很长一段旅途不得不和他分居两地，身体也同样不好，也在病房日夜陪护、同吃同住，一连陪了两个月，最后一次长厮守。最宠爱的孙子孙女，每每病床前玩闹让他喜滋滋看着，戏称这是最好的“孙子疗法”……熟悉的人都说，江上舟在最后的日子里有了一次大团圆。

既然生命无法再续，那么，最后这一程，有热爱的工作陪伴，有挚爱的亲人陪伴，已是最大安慰。

江上舟走了，但不止一个人这样表示：“好好把事情坚持做下去，这一定是他最喜欢的纪念。”既然生命无法再续，那么，当他离开后，有如此多的知心，有这么多的人在继续坚持，这应该是他最大的欣慰，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原载2011年9月19日《新民晚报》，有删节